

基于场域理论的美国亚太战略 体系演变分析

杨美姣

[摘要] 随着国际社会“时”与“势”的转变,国际政治格局发生了关键变化,美国的亚太战略演变路径也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基于场域理论的模型,结合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强位势优势和高威胁认知的双重作用影响了“轴辐体系”的产生,弱位势优势和高威胁认知则刺激了“小多边”盟伴体系的建立。二战结束以来,美国的亚太战略架构经历了从“轴辐体系”到美式“小多边”盟伴体系的演变。在中美实力对比变化及地缘政治博弈升级的背景下,美国的亚太战略也显现出“变”与“不变”双重形态,“变”的是美国在亚太的位势优势有所减弱,“不变”的是其对亚太场域仍秉持着一种较高程度的威胁认知,均服务于美国的霸权护持。鉴于此,中国可以通过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强化自身影响力、探索域内外交往新模式、提升国际传播效能等加以有效应对,在国际竞争中赢得更多战略主动。

[关键词] 位势;威胁认知;场域理论;轴辐体系;盟伴体系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3654/j.cnki.naf.2024.06.004

[文章编号] 1003-7411(2024)06-0047-(15)

[收稿日期] 2024-05-30

[基金项目] 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创新项目(2023YZD025)

[作者简介] 杨美姣,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北京 100092)

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架构经历了从“轴辐体系”到“小多边”盟伴体系的转变。美菲、美泰、美韩、美日等双边同盟构成了以美国为“轮轴”,若干亚洲国家为“轮辐”的非对称权力模式。而自奥巴马政府开始,美国战略重心逐渐东移,经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先后推行“印太战略”并不断升级,在亚太地区形成了美日菲三边峰会、美日韩三边框架、美英澳联盟(AUKUS)、美日印澳四国集团(QUAD)、美日菲澳四国防长会谈、美加新英澳五眼联盟(FVEEY)、美日澳英新“蓝色太平洋伙伴”(PBP)等七大“小多边”盟伴体系。美国还主导于2024年6月底至8月初举行的有29国参与、2.5万名人员参加的“2024年环太平洋军事演习”(RIMPAC 2024),进一步加剧了亚太的紧张局势。^[1]在中国地区和国际影响力增强的背景下,

NORTHEAST ASIA FORUM

亚太地区逐渐成为美国全球战略的重心和影响国际格局的重要场域。美国不仅着力于继续强化亚太联盟安全网络体系,还与新兴大国构建更深的伙伴关系、强化区域机制,防范中国崛起的态势日趋凸显,意在将中国“规锁”进其亚太安全架构,利用合作和竞争两种政策手段将中国限制在武力挑战美国世界主导权的范围内。^[2]但随着霸权焦虑和不安全感的增加,美国钩织众多美式“小圈子”试图围堵和遏制中国的发展。

在中美竞合关系不断变化的国际背景下,美国的亚太战略架构演变路径、特征及其战略变化背后的理论逻辑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点。本文以场域理论的分析框架为基础,结合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发展历程,提出了位势和威胁认知两大核心变量,从体系、结构、认知等层面深入阐释了美国的亚太权力动态转移诱因及机理。经逻辑演绎和现实案例验证得出,二战结束以来,美国的亚太安全架构从“轴辐体系”转变成了当下的“小多边”盟伴体系。虽体系的表现形式有所变化,但美国进行霸权护持的野心依旧。这一研究对于深刻理解美国的战略本质,为中国更有效地处理中美关系、管控美国的“阵营对抗”提供了重要视角和现实路径。

一、对既有研究的述评

国内外学者们从不同视角阐释了美国的亚太战略体系,以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为代表的国际政治理论分别从权力差异、制度的有效性和观念认同等方面进行了研究,接下来本文将分别对此进行批判性梳理。

(一)现实主义:权力差异的影响

金桑俊(B.Sang-Joon Kim)与韦伯·莱斯特(Webb Leicester)认为,美国在亚洲需要承担巨大的防务压力,没有必要放弃或限制自己的自由权,欧洲国家有能力为北约提供经济和军事支持,但亚洲国家并不能做到这点。^[3]这一观点夸大了欧洲国家的效能。事实上,二战后欧洲国家经济、制度体系遭受重创,需要美国提供大量援助,短时间内尚不足以为美国提供军事上的补偿性支撑。唐纳德·克朗(Donald Crone)从权力方面给出了解释,美国与亚洲国家存在巨大的权力差异,亚洲国家不论是独自还是整体,能够为美国所塑造的集体安全体系的贡献都很小,且在亚洲建立多边主义会限制美国的行动,因此美国与亚洲国家建立的是一种极端霸权(extreme hegemony)的关系。^[4]如果美国认为在亚洲建构多边主义框架会限制其自身的行动,则无法有效解释其在欧洲建立北约的行为。有学者认为,美国鉴于内外交困无力单独应对中国,希望将盟国都捆绑到其维护全球霸权和战略重心向亚太转移的战车上,其亚太联盟体系正由“空心”转向“实心”以对中国形成“综合遏制”。^[5]其实在“轴辐体系”中,美国对亚太地区已形成排他性控制,且一直从此地汲取原材料,如橡胶和锡矿等,亚太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发挥着“实实在在”的作用。斯蒂文·韦伯(Steven Weber)则指出,美国决策者认为二战后多边主义比双边主义更稳定,因此鼓励在欧洲建立独立于美苏集团的独立多边主义以营造更和平的氛围,而美国也确实曾试图通过扶植日本在亚洲建立独立的权力中心,但并未成功。^[6]这种观点美化了美国在欧洲和亚洲的战略布局,同时也没有阐释为何在亚洲未成功建立多边主义的具体原因及日本在建立安全体系中的因素。

车维德(Victor D. Cha)提出了高压攻势(powerplay)的概念,他认为东亚地区之所以呈现出双边主义为主导的安全结构,是因为美国试图建立一种旨在对具有潜在威胁的盟友施加最大程度且具排他性的控制。^[7]就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在美国的全球战略研判中,苏联在欧洲的威胁远大于亚洲“无赖国家”的威胁,美国在欧洲以英国和法国为抓手建立强多边的军事联盟北约以抵抗苏联,按照这一理论逻辑也可以在亚洲建立北约似的多边机制,不仅可以抵抗苏联威胁,还可以分散美国的防务压力,但事实并非如此。美国推进亚太小多边机制是其强化对华战略竞争的产物,企图借此实现安全威慑、供应链重塑、科技竞争、意识形态压制等多重政策目标,加剧亚太地区的军备竞赛,增大中国在周边地区面临的军事安全压力。^[8]美国在太平洋地区主导诸多联合军演,不仅是为了从军事上对中国施压,也是威慑中国的一种方式,尤其是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成功实施。

20世纪四五十年代,一方面为防止亚洲其他国家发生倒向共产主义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另一方面太平洋地区对美国的原材料供应至关重要,美国调整了其在亚洲的布局,开始实施“防御周边”战略(defensive perimeter strategy)。朝鲜战争的爆发促使美国更为重视亚洲防御周边的重要性,倡导建立集体防务协议,后暂时被搁置,以东南亚条约组织(SEATO)这一较为松散的地区组织加以代替。美国对SEATO采取与北约这种集体安全体系的强安全承诺截然不同,SEATO国家在遭受攻击时只会被认为是危害到了其本身的和平与安全,美国和其他国家并无义务保护受攻击国。^[9]这种阐释忽略了二战后亚洲国家的具体历史,对于刚从殖民历史摆脱出来的一些亚洲国家而言,域外大国的强承诺安全体系反而会刺激这些国家的反抗和抵制,并且将SEATO指认为美国的“亚太版门罗主义”尚需进一步探究。

(二)自由主义:责任分担与制度有效性

自由主义者认为,多边结构和规则是遏制单边主义倾向的有效途径。^[10]美国也曾在亚洲地区尝试建立过诸如太平洋共同防卫组织(ANZUS)和SEATO等安全组织,后者以失败而告终,ANZUS也成为了仅在美国和澳大利亚之间有效的条约。约翰·伊肯伯里(G. John Ikenberry)基于制度的有效性指出,美国采取多边主义便于实施锁住(lock-in)战略,但其在亚洲则没有这样的目标,因为在亚洲可以实现绝对霸权,这促使美国选择在亚洲采取双边主义,因为多边主义一定程度上会限制美国的政策自由。^[11]这忽略了美国在亚洲建立多边主义框架的历史尝试,此外,认为多边主义的有效性优于双边主义尚无定论。

伊肯伯里的观点后来发生了转变,认为新世纪以来东亚的安全秩序是一种中美双重等级体系(dual hierarchical system),双等级体系可能会比较稳定。^[12]在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现实中,国家在做出决策时很大程度上会受突发事件、领导人的错误知觉等因素的影响,美国对中国在东亚地区崛起的容忍度到底如何、中间国家对结构压力及国家安全的评估是否会随着美国加紧在印太地区的战略部署而转变,以及随着美国和日本对价值观外交的宣扬,意识形态对国家战略的影响到底有多大等方面都是需要考量的要素,基于此,国家的理性主义在现实操作中会受到一定限制。

丹尼尔·尼克森(Daniel Nexon)与其合作者认为现存的美国联盟体系类似于传统的帝国体系,因为两者都呈现出轴辐特征。^[13]冷战结束后,美国试图调整与盟国的关系,使其从等级制

结构向相对平等或平行的分工结构过渡,也开始与其他国家建立友好或者伙伴关系,并推动与它们在外交和安全领域开展协调与协作,美国与盟友的关系从等级制转向扁平化。^[14]轴辐体系本身并没有排除“辐”成员间的联系,只是成员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不同。澳大利亚学者吴翠琳(Evelyn Goh)认为,美国在东亚地区建立的就是一种轴辐体系,日本和韩国这一体系的核心,后来也逐渐扩展到了诸如泰国、澳大利亚等。美国建立的这种体系具有某种程度的稳定性,原因在于,双边联盟体系为美国发挥影响力提供了更有利的政治和地理基础,且更为有效地明确双方的承诺和机制,这为美国在该地区的战略部署提供了确定性和可预测性,同时该联盟体系为美国提供了话语权的制度化机会。^[15]美国在加强对华战略竞争的同时,降低联盟维系的成本,让盟国和伙伴国共同分担美国霸权护持的任务,且加剧地缘政治竞争与对立,迫使地区国家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16]在美国的亚太战略中,遏制中国是其优先事项,在构建诸多小多边盟伴体系时注意到了刺激地区国家作出不利于己的选择,且在极力拉拢更多国家进入此体系,这也是为何其小多边机制的对象并非全然是盟友,也包括一些战略伙伴。

泉川康弘(Yasuhiko Izumikawa)认为,美国为日本提供了强安全承诺,降低了日本与韩国建立紧密联系的动力;韩国因为历史记忆问题,排斥日本加入地区多边联盟,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只能强化目前的联盟,这反而更加强了轴辐体系。^[17]这种观点夸大了地区国家的作用,对美国关于地区的影响做了被动解释,地区战略的调整只是强度和形式上的改变,美国的主导控制并没有发生本质变化。

(三)建构主义:身份认同上的差异

迪克·威尔逊(Dick Wilson)指出,美国给其亚洲盟友作出了预设,他假定其亚洲盟友相互之间过于分裂以至于不能建立美国保护伞下的集体防务体系。^[18]这种假定的说服力并不强,夸大了美国亚洲盟友间的争端,也弱化了大国在维护多边安全体系中缓解争端的能动性。王缉思从身份政治的角度探讨了中美权力竞争,他认为中美两国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民族国家,都持有比国家更大的身份认同,中美之间的斗争,已经远远超越实力对比变化和意识形态冲突,身份政治对中美关系有更为深远的影响。^[19]约翰·杜菲尔德(John S.Duffield)重视历史记忆对国家行为的建构作用,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在东亚地区的暴行及对亚洲人民的伤害使得亚太国家不愿意将日本纳入多边同盟之中,而这种态度也阻碍了亚太多边框架的建立。^[20]这一观点并不能解释为什么有些亚太国家支持日本加入多边框架。美国着力构建以遏华为目的的“价值观同盟”,意图通过经济、政治与意识形态相互捆绑孤立中国,经济上炒作“中国威胁论”;政治上强调美国与盟友间的共同价值观纽带,公开给中国、俄罗斯等大国贴上所谓“威权国家”“胁迫外交”的标签。^[21]其实是以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为工具试图分裂亚太国家,并且在此地区插入“楔子”,只是运用本就存在的途径,人为制造割裂和对立。

阿米塔·阿查亚(Amitav Acharya)从亚洲的角度提出了一种规范性的解释。他认为,亚洲地区没有形成北约似的组织是由二战后早期地区交往合作而形成的反对集体防务的规范所造成的,大国主导和干涉地区的新形式的集体防务失去了合法性,美国在亚洲地区就只能选择双边主义。^[22]他在另一篇文章中认为,全球主权规范,尤其是不干涉理论在地区化后就会刺

激地区国家对主权和参与权的意识觉醒。^[23]亚洲特殊的被殖民历史使以印度为代表的国家对域外国家的加入非常敏感,反对外界干预,甚至扩大到反对地区内部形成集体防务,但这里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对集体防务的反对是一种规范吗?也许这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共识。并且在亚洲国家内部也并不是铁板一块的反对集体防务,而像菲律宾和泰国等国就热衷于集体防务的建立。美国倡导权力中心在地理空间的竞争;而中华文明是在同一空间的兴衰,是周期性的更新。可以说,美国对华误解根源在于时空的错位,这也是中美实现“相互理解”的最大障碍所在。^[24]这一观点提供了认识这一问题的文明视角,不过这并非中美竞争背后的决定性因素,且文明的分类本身就带有建构的意味。

阿瑟·斯坦(Arthur A. Stein)认为,由于这两个地区存在结构差异,欧洲中等国家的存在发挥关键作用,而亚洲地区殖民力量的重返在短时间内阻碍了地区安排,地缘政治的差异塑造了地区安全的条件,最终美国在欧洲建立了北约,在亚洲则形成了双边主义为主的“轴辐体系”。^[25]他在文章中仅指出了地区国家的决定作用,但其存在的问题是,面对权力差距悬殊的美国和亚太国家,地区国家能否在安全框架的设计上起到决定性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夸大了地区国家的影响。

(四)其他研究路径

贺凯(Kai He)和冯慧云(Huiyun Feng)两位学者从政治心理学的角度引入了前景—威胁理论(prospect-theory),通过将威胁程度设定为领导人对收益和损失前景的参照点,他们提出了两个关键论点,第一,高威胁使决策者关注损失,多边联盟成为更有利的联盟选择,为了换取多个盟友的帮助以避免进一步的战略损失,国家更可能承担限制其行动自由的风险。第二,低威胁使领导人关注收益,此时双边联盟胜出,因为国家在通过与较少盟友联盟寻求安全时对维持其行动自由的风险有所顾忌。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使美国认知到亚洲地区的高风险,因此它试图建立多边机制,但对美国而言,日内瓦和会后东南亚地区变成了低风险区,所以它不再愿意做出任何军事或经济上的强承诺。未来美国是否会在亚洲建立北约似组织还需要参考美国如何认知亚洲的威胁。^[26]前景—威胁理论的分析模式提供了认识亚太安全体系的新思路,但是这一分析视角只关注到了大国和强国的战略偏好,对于威胁程度的认知还与具体国家有关,对于小国而言在风险不明确的国际体系中可能会更偏向对安全的追求,与大国的双边关系或者其他可为其提供安全保障的多边关系都会成为其考量范围内的问题。

针对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安排,学者们从权力差异及对全球霸权的掩饰、责任分担及制度有效性、身份认同的差异和其他研究路径给出了解释。本文通过对以往研究进行批判性采纳,将社会学中的经典理论模型场域理论引入国际政治领域,以位势^①和威胁认知为分析变量,搭建了分析美国自二战结束以来在亚太地区的分析框架。

二、基于场域理论的分析框架

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场域理论认为,场

① 位势:在国际政治中,主要指国际社会行为体相对权力的对比及其变化,位势是场域理论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因素。

域(field)中充斥着力量和权力较量,因此也可称为权力场域,这是由不同的资本类型和权力形式之间的关系决定的,具有某种惯习^①和占有不同资本的行动者为了维护或改变彼此之间的力量关系而争夺权力,以期让自己获得占有支配性资本并进而获得支配性位势。^[27]在国际政治领域,无政府的国际社会使得国际社会行为体也对权力给与了更多关注,但是与传统的现实主义不同的是,场域理论不仅强调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性,还转变了逻辑基础,从关系出发引出实体:关系→实体。关系塑造了实体的认知和行为,这一点与建构主义也存在区别,建构主义的逻辑基石仍是实体。场域理论同时强调实践的模糊性,即实践既不是完全本能支配的机械的反逻辑过程,也不可能是完全合乎理性主义的逻辑过程,而是会受一种“前理性”或“前逻辑”的“实践感”的支配。^[28]基于场域理论强大的分析效力,本文在此基础上以新的视角分析阐释二战结束以来美国的亚太权力动态转移诱因及机理。

(一) 关键概念界定

场域。场域是场域理论中的关键概念,意指各位置之间以关系连接起来的网络或领域,是一个争夺资本的空间,其特性是社会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关系中的各位置决定了场域的本质,而各个位置是被结构化的。本文所指的场域是指国际政治中随着位势变化和权力博弈形式各异、强弱不同的空间区域。在场域中,具有某种惯习的行动者根据所占资本多少而自觉或非自觉地采取策略。场域具有能动性,对影响社会行动者及其实践的力量具有形塑功能。各场域都有其相对自主的运行逻辑,但都是在网络结构中发挥作用,并不断通过再生产产生出新的结构,因此,行动和结构是相互决定的。此外,场域是关系的系统,行动者之间的关系受其所占位置、角色、其本身所拥有的资本的限制,促使行动者在行动时不得受到惯习的影响。惯习是构成知觉、评价和行动的系统,受社会条件制约,又具有生成性。资本是场域变化的动力,场域是资本存在和斗争的基础,行动者必须根据场域的各种关系来制定策略。在场域中,位置、关系、资本和惯习是发挥重要作用的要素。

位势。布迪厄指基于所占资本差异而获得的相对权力位置,从长时段来看,在国际政治领域,由于国际社会行为体的相对实力不断发生变化,因此本文的位势是指,相对权力的对比及其变化。沃尔兹认为国际政治结构由三部分组成,首先是它的排列原则,其次是单元所具有的功能,再次是单元间能力的分布(distribution)。由于体系排列原则和单元的功能都具有一定意义上的稳定性,所以单元间能力分布的变化对于国际体系转变的影响最大。^[29]在无政府状态之下,国家会时刻注意其权力位置的变化,施威勒认为国家间的竞争是“位势竞争”(positional competition)。^[30]由于对相对权力及在体系中排序的重视,一般意义上国家在交往中更关注相对收益而非绝对收益,当国家在交易中获得收益对自身的相对权力地位产生削弱作用时,国家可能就不再考虑其将获得的绝对收益。

威胁认知,指在交往中,国家、个人或组织对(可能)产生的威胁或风险的预期或判断。根据威胁的性质,可分为真实的(从相对清晰的意图和信号中推断出来的)、潜在的(从外部因

^① 惯习是构成知觉、评价和行动的系统,受社会条件制约,又具有生成性。在布迪厄看来,惯习是具有前理性和能动性的实践感存在的基础,不仅源于历史还生成历史,是一种“体现在人身上的历史”(embodied history)。

素、环境或对手带来威胁的能力分析出来的)、想象的(这时的威胁虽然对感知者来说是“真实的”,但并没有客观的证据加以支持)。对博弈论者和防御战略家而言,威胁是一种战略,是一方通过偶尔的惩罚手段试图影响另一方的有意行为,而对社会心理学家而言,威胁则是对预计危害的感知。^[31]由于国际社会、国际环境的不确定和不明确,很容易发生错误知觉,并且大多数错误知觉都是在夸大对方的敌意,从而视对方为具有潜在威胁的对手。^[32]而当威胁没有被认知的时候,即使存在明显证据,在动员防御资源方面也存在困难。^[33]基于此,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中,国家为了维护自身安全,面对“充分的”敌意和不确定性,通常会产生危险预期。^[34]

(二)理论分析框架

本文的理论基础是布迪厄的场域理论,这一理论综合了主客观两方面的因素,融合了体系、国家、个人三个层面的分析要素,修正了以往国际政治理论中从实体出发的逻辑起点,更加强调关系的重要性,整个国际政治场域就是一个关系系统。需要强调的是,布迪厄场域理论中的系统不同于卢曼(Niklas Luhmann)的系统理论,这大致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斗争是场域理论的核心,在分析场域理论时冲突概念占据重要位置,而在卢曼的系统中,斗争不是关注的重点;其二,布迪厄认为不同场域之间不是截然划分的,场域之间也可能会建立某种统一性,形成某种类似于国家这种发挥元功能的“元场域”;其三,场域中的持续斗争使得场域的运动变化表现出了历史性,只有在不断变化的差异以及具体的关系中才能真正理解场域的结构。^[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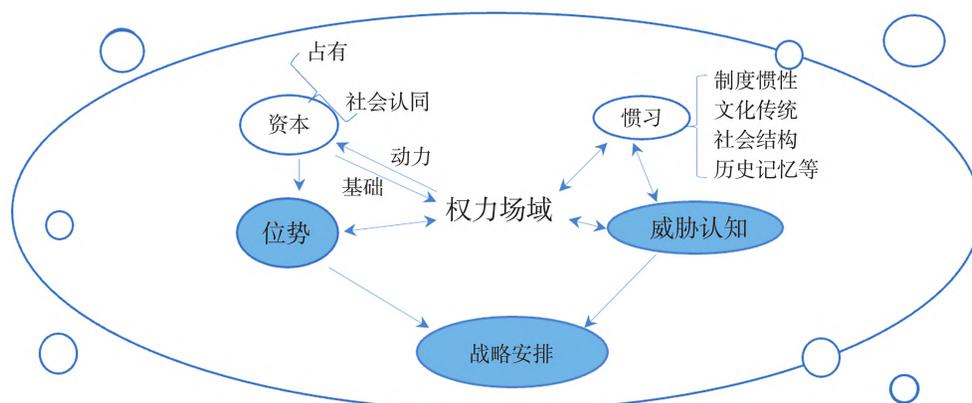


图1 战略架构的理论模型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其中○代表不同场域。

如图1所示,在权力场域中,国家位势本身包含了权力资本,国际社会行为体因拥有某些权力资本而占据一定位势,也正是在某位势上也才能获得或生成权力资本。同时,由于关系和斗争是场域的典型特征,因此位势也处于变动之中。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国际社会行为体对于在国际格局中位势的追求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位势的高低影响着行为体主导权的多少,也直接影响了对影响国际事务的决定权和话语权。“正是这些位置(本文为位势)的存在和它们强加于占据特殊位置的行动或机构之上的决定性因素之中,这些位置得到了客观的界定,其根据是,这些位置在不同类型的权力(或资本)——占有这些权力就意味着把持了在这

一场域中利害攸关的专门利润的得益权——分配结构中实际的和潜在的处境,以及它们与其他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支配关系、屈从关系、结构上的对应关系等)。”^[28]而威胁认知强调了国际社会行为体对形势的研判,既包括避险维度,也包括获益维度,其在形塑结构和被形塑的过程中将对情势的感知融进思维认知和实践之中。权力场域的竞争强度与惯习等要素则影响着威胁认知的高低,在权力场域中,位势和威胁认知的不同强弱组织决定了战略架构的不同形态。

(三)逻辑演绎机制

根据场域理论,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在全球所占权力资本最强,而反观亚洲国家多为被殖民国家,实力羸弱,不管是发展水平还是工业化程度都远低于战前,且多为原材料供应地,仍处于工业发展的初级阶段。在亚洲权力场域中,亚洲国家与美国之间形成了极大的实力差距。同时,美国认为亚洲国家多为“异类”的专制独裁国家,亚洲国家与美国处于不对称的权力关系中,前者属于“低等”民族国家,寡头领导人可能会为了获得统治权而产生引起骚乱的权力斗争,有将美国“牵连”(entrap)进不必要冲突中的风险。此外,独裁政权一直被以民主自居的美国视为威胁,如若防范不力可能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这对于美国在全球推行“民主化”或“美国化”将是严重的挑战。美国在亚洲地区获得了一种压倒性的强位势优势,且对亚洲的威胁认知程度较高,使其有能力、有意愿对亚洲国家采取众多针对性的双边机制以更好地控制和塑造对象国的行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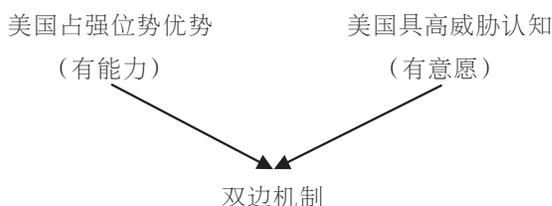


图2 轴辐体系的产生机制

(以美为中心的双边机制的对象国之间联系脆弱,此众多双边机制共同构成了亚太地区的轴辐体系)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及在全球治理中影响力的提升,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位势发生重要变化,从原来的压倒性位势优势演变成了大变局下的弱位势优势,主要体现在中国与亚洲国家的经济联系更为密切、中美在亚洲的军事实力差距不断缩小、中国的外交影响力显著增强等方面。在威胁认知方面,美国在亚太地区将中国捏造为“秩序破坏者”“系统性威胁”,为了维护甚至扩张美国在亚太的霸权优势,弥补“力不从心”的不足,极力扩大区域的范围,寻求一种“开放的”、边界模糊的边界范围,以此便于美国及其他域外国家的干涉性介入,这也是美国在多个多边机制中不断强调所谓的“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逻辑。从“亚太”到“印太”的转变,美国一直构建一种大战略之下的术语模式,区域范围的扩大一方面降低了域内某一个国家的影响力,也为其他国家的加入提供了某种片面的“合理性”,同时为美国拉拢域内外盟伴建立多个小多边机制提供了所谓的“法理”支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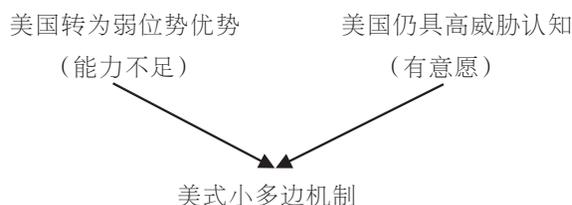


图3 美式小多边机制的产生机制

（拉拢域内外盟伴进入亚太地区，弥补美国相对于中国的弱位势优势）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本文在场域理论的视域下，结合国际形势，演绎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架构演变。在国际政治领域，位势是这张场域之网中的各个节点或者网结，不同国际社会行为体在复杂的国际交往关系中居于不同位势，而也正是它们所处位势的不同，发挥的作用和扮演的角色也截然不同。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在亚太的位势经历了从强位势优势到弱位势优势的转变，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在亚太发挥能力的强弱和自由度。与此同时，包括社会结构、制度惯性、文化传统、历史记忆等在内的各要素塑造着行为体的惯习，威胁认知的高低受惯习的影响，美国对亚太的威胁认知并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仍将亚太识别为影响其国家利益的重要场域，在接下来的案例分析中将进一步通过具体史实和数据加以验证。

三、二战结束以来美国亚太战略架构的演变

结合上文场域理论的分析框架，本文提炼出位势和威胁认知两个核心变量，其中位势主要受到权力资本的影响，惯习影响着威胁认知的强弱，位势和威胁认知双重因素的参数组合不同，国家会倾向采取不同的策略。二战结束以来，美国的“印太战略”架构经历了从“轴辐体系”到“小多边”盟伴体系的演变。究其原因在于，国际社会“时”与“势”的转变刺激了关键国家位势和威胁认知的“变”与“不变”。在亚太这个场域中，美国原来的压倒性位势优势变为弱位势优势，而威胁认知的程度则一直处于较高程度，其在亚太的战略安排也从有能力、有意愿在亚太获得主导性或排他性控制，变为能力不足、但有意愿发挥排他性的权力影响力。当美国处于强位势优势和高威胁认知时，双边机制胜出，这也是美国在二战后建立了诸如美菲、美泰、美韩、美日等双边同盟的内在逻辑。在中国实力和影响力增强的过程中，美国在亚太处于弱位势优势和高威胁认知，此时仅凭美国难以遏制中国在亚太发挥排他性影响，拉拢域内外盟伴构建众多小多边机制成为选择，这可从美国近年逐渐建立日益紧密的盟伴体系得以验证。

（一）强位势优势与高威胁认知下的“轴辐体系”

美国资本主义在二战结束后的二三十年经历了黄金发展时期，战后建立了由美国主导的经济治理体系，包括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后被WTO代替）和布雷顿森林体系（包括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用以充当美国管控和支配全球金融经济的有力工具。美国在战后大量输出美元，如马歇尔计划中输出170亿美元援助欧洲国家和日本，并非只是为了应对与苏联的冷战需要，更重要的是将美元变成了世界经贸体系的共同货币及折算基础。^[36]当时美国的生产总量占世界生产总量的一半左右，世界黄金储备的三分之二、世界资本的四分之

三、全球海运的一半均被美国控制,且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空军,其舰队数量比其他所有国家舰队的总量还要多,美国航空母舰使其权势有可能投射到世界的每个地区。^[37]美国已然成为了世界最强大国家,而反观战后的亚洲国家,则是经济凋敝、百废待兴,亚洲不仅面临着复苏的紧迫性,还需要进行非殖民化运动,在追求独立的过程中还存在着独立后由谁统治的难题。根据战后形势可知,二战结束后美国在全球具有主导性的权力资本优势,相对于实力羸弱和冲突频仍的亚洲国家而言,美国的资本优势几乎是压倒性的。

不仅如此,二战后亚洲的综合发展潜力尚不明显,且即使亚洲经济得到复苏,其在全球政治格局中仍处于较低地位,这些都加剧了美国与亚洲之间的位势差异。对于美国而言,亚洲是原材料的重要来源,工业基础和水平尚不足以使其实力能够与传统的西方大国匹敌。在亚洲地区,美国不仅具有压倒性的经济资本,还拥有支配性的文化资本和象征资本。正如菲律宾学者指出:“美国对菲律宾社会进步的最大、最持久的贡献不是物质利益方面,而是在教育、卫生、个人自由和政治觉悟方面。”^[38]美国在亚洲其他国家的影响也不断扩展,不管是经济资本的影响还是文化资本或象征资本的影响,这些都构成了美国对亚洲强大的资本优势,进而建构其在该地区的强位势优势。

根据场域理论,包括意识形态和身份上的认同在内的要素影响了行为体的威胁认知。而这区分了自我和他者,在同一个群体内更注重绝对收益,对群体外的行为体更关注相对收益,认同也是影响多边或双边组织架构的重要因素。^[39]有学者分析,亚洲国家更容易受被殖民的历史仇恨、国家主权等的影响,亚洲被排除在了美国的文化圈层,美国对亚洲存在不信任感,也不值得在此建立一个多边机制,美国也从未像在欧洲对待德国那样(积极将德国纳入北约这一多边机制之中)对待日本。^[40]美国认为,亚洲国家不仅尚未“文明开化”且只是接收命令服从的对象,是拥有丰富资源和需要白人领导的区域,在这样的背景下就谈不上平等主体之间的多边合作,只适合美国单边的直接统治。^[41]如哈特所言,在美国的外交政策中有一种惯习式的长久而稳定的传统,将世界划分成不同的种族等级中,其中美国和英国属于第一序列,之后是欧洲国家,最后才是亚洲、拉美和非洲国家。^[42]与亚洲没有认同和共同的信仰,两者属于不同的等级阶层,亚洲国家属于更“低等”阶层,所以美国倾向采取双边主义。^[43]所以如图2所示,美国主导建立了诸如美韩、美日、美泰、美菲等多个双边同盟,便于发挥非对称性的直接控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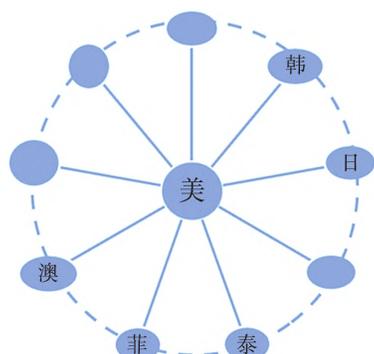


图4 双边同盟为基础的亚太“轴辐”体系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时至今日,虽然经过外交语言修辞,在美国的外交政策中这种种族划分等级已不那么明显,但其对亚洲、非洲、拉美等地区的作为也证明了这种种族等级歧视一直未发生本质变化。

美国同时担心亚洲国家有将其拖入不必要冲突中的风险,这体现了场域理论中历史记忆和制度惯性对威胁认知的影响。二战中亚洲的民族主义情绪被激发了出来,“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鼓舞了亚洲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同时也在这一过程中争夺国家统治权,美国也不同程度地被卷入了东亚地区的争斗中,如美国支持

东印度群岛对抗荷兰的施压,对菲律宾群岛的主要美军基地拥有控制权,并操纵着菲律宾的政治体系,卷入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等等。虽然美国一直谨慎地避免在与弱小国家交往中陷入联盟的“牵连”困境,但在东亚仍有10万多美国军人在一些冲突中丧生,同时美国也投入了巨大财力和资源,但仍无法完全从亚洲的泥潭中完全脱离出去。^[44]建立双边机制不仅便于美国直接控制实力弱小的盟友且能培养其对美国安全保障的依赖,鉴于历史经验,美国一直避免被“牵连”的困境,艾奇逊曾明确表示蒋介石永远别想将美国拖入第二场“中国内战”中。^[45]对于韩国李承晚政府拒绝与朝鲜和平相处而采取的“北进统一”政策,美国甚至考虑撤换李承晚而选择扶植其他支持者,目的就是牵制韩国避免发生美国不可控的情势变化而不得不投入不必要的军力和资源。^[46]

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因获得了绝对资本优势,而在全球场域中占有强位势优势,尤其在亚洲地区,美国的强位势优势特征更为显著。在美国的种族等级惯习中,亚洲国家与美国和欧洲国家属于不同等级的群体,亚洲属于较“低等”阶层,与美国和欧洲没有共同的民主价值观念、宗教信仰和身份认同,尚处于“未开化”阶段。其自身的权力斗争和非殖民化运动有将美国牵连进冲突的风险,在亚洲这个权力场域中,美国对亚洲的威胁认知程度较高,“轴辐体系”能更直接和有效地发挥美国的主导和支配作用。

(二) 弱位势优势与高威胁认知下的美式“小多边”盟伴体系

在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之际,美国在亚太场域中处于一种弱位势优势和高威胁认知的情境。在此影响下,如图3所示,美国积极拉拢域内外国家建立多个美式小多边机制,如美日菲澳四国防长会谈、PBP、AUKUS、QUAD、美日菲三边峰会等。为了“对冲”(hedge)脱欧后国家能力的相对下降和在亚太地区战略空间受到的挤压,英国强化了在亚太地区的存在,在南海问题上采取追随美国的措施;而随着中美位势的变化,法国不断在其中寻求平衡;德国在亚太事务中更加克制和审慎,其举措的象征意义更加突出。美国主导建立了多个美式小多边机制,这些都是其亚太联盟体系的一部分,意在与中国周边国家建立更加深入的关系以对中国形成围堵之势。

在位势方面,美国在亚太场域的位势发生重要变化:从原来的主导性位势优势演变成了大变局下的弱位势优势(这并没有否认美国在当今世界中的绝对实力地位,是指随着美国自身发展速度的放缓及地区大国的崛起,美国在亚太的相对位势优势减弱)。主要是因为,二战结束以来,美国依据世界领先的军事大国、最强大的工业品制造国和首要债权国获得了显要有力的位势,成为了战后最强大的综合性大国。^[47]但是冷战结束后,尤其是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世界经济体以来,中美之间的实力差距不断缩小,据澳大利亚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Lowy Institute)2023年发布的亚洲力量指数显示,2023年中国综合实力指数为72.5,美国为80.7,2018年至2020年中国的综合实力指数连续上升,分别以74.5、75.9、76.1位列第二,受多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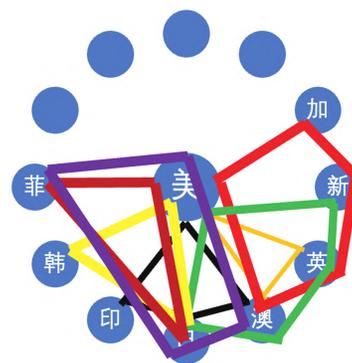


图5 大变局下的美式“小多边”盟伴体系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因素影响2021年中国综合实力指数稍有下降,不过仍以74.6的综合评估指数排名第二,相对而言,美国2018年至2021年的指数不断下降,分别为84.6、84.5、81.6,2021年综合实力指数为82.2。^[48]在实力资本的相对变化之下,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位势。

从“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到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发展,截至2024年7月,中国与150多个国家和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0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为打造新的合作增长点、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落实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提供了有力支持。^[49]截至2023年10月,中国已同周边28国和东盟建立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伙伴关系、合作关系或战略互惠关系,同湄公河五国确定共建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同中亚五国宣布打造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与12个陆地邻国通过谈判解决了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同周边9个国家签署了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中国与周边互利共赢合作不断深化,中国是周边18国的最大贸易伙伴。^[50]近年,虽仅从军事能力看,美国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中美之间的军事能力差距在不断缩小(2019年差距28.6,2020年差距26.7,2021年差距24.9,2023年差距22.6),变化尤其明显的是中美在亚洲的海军影响,2019年美国高出中国的指数是31.8,但到2023年此指数变成了16,中国在亚太的综合影响力在不断提升。^[48]大变局下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和区位优势的提升,美国在亚太地区转变为一种较以往相对较弱的位势优势。

在威胁认知层面,美国对亚太地区的威胁认知仍处于较高程度。从影响威胁认知的身份认同上看,美国对亚洲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异质性观念并没有发生本质变化,美国在冷战思维之下认为中国的发展必然会对自身构成“威胁”,进而产生了一种对于自身权力地位的“不安全感”。同时美国威胁认知的主体出现了新老“中国通”的代际转变,相对于老中国通,新中国通们目睹的是逐渐发展为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和“式微”的美国,他们的外交风格更具有竞争性。而从地缘政治来讲,亚太地区在美国战略中的地位未降反升。美国先后通过“亚太再平衡”和“印太战略”强化在亚太地区的存在,此外在中国周边配置了逐渐增多的美国综合力量,尤其是其军事兵力,分别体现在陆军、海军、海军陆战队和空军的部署上,其中海军陆战队拟在2030年建立三个濒海作战团,其中两个部署到关岛和冲绳。与此同时,美国也相应调整了其政府机构以适应对亚太地区的竞争,包括在国家安全委员增设涉华部门、在国务院规划成立“中国屋”、在中央情报局合并伊朗和朝鲜任务中心而增设中国任务中心等。

美国宣传或奉行所谓的多边主义,其实质是为了在权力场域中获得排他性控制,在世界范围内维护和扩展其霸权地位。多边主义的姿态只是美国建立霸权的掩饰工具,美国真正关心的是权力分配格局以及这种格局下的利益分配。^[51]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等表明美国实践的多边主义只具有形式意义。美国宣布自己尊重多边规则并不代表它愿意和真正贯彻规则和契约,尤其是在这些规则不利于美国追求其自身国家利益和对其霸权目标产生约束之时更是如此,或操纵或无视规则,或退出现有多边框架,或建构新的多边框架。在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内,预计美国仍将会继续主导联合其他盟国或伙伴加入到美国的亚太联盟体系中,构建美式小多边机制,或将着力强化“岛链战略”,而在地理范围上也会有所扩大,形成了跨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的三洋联动。

四、结论

本文以场域理论为基础,结合国际政治运行逻辑,提炼出位势和威胁认知两个核心变量,搭建了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在亚太场域中的战略架构演变模型,分析了美国在亚太的位势经历了从强位势优势到弱位势优势的转变,这直接影响了其发挥影响力的自由空间,美国对亚太的控制性影响由原来的能力充足变为“力不从心”。社会结构、制度惯性、文化传统、历史记忆等要素通过影响惯习而对威胁认知发挥着重要作用,从美国和亚太国家来分析,美国对亚太的高威胁认知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依据场域理论,在强位势优势和高威胁认知作用下,美国会偏向构建双边同盟机制,而弱位势优势和高威胁认知则会催生诸多小多边机制,这也是美国会拉拢域内外盟伴构建防范遏制中国的网络体系的深层诱因。

基于此,中国可以采取以下三方面的措施加以有效应对。第一,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平台,从广度和深度上强化中国的影响力。优化区域开放布局,继续实施“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计划,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能源、税收、金融、减灾等领域加强多边合作平台建设。第二,扩大中国与域内外国家的“朋友圈”,探索与亚太、非洲、拉美等地区的交往新模式。这包括但不限于深化与现有伙伴国的关系,同时争取在中美之间实施对冲策略的国家。第三,提升中国的国际传播效能。不仅要加强国际传播的理论研究,掌握国际传播的规律,构建对外话语体系,提高传播艺术,还要采用贴近不同国家、不同群体受众的精准传播方式,同时运用好全媒体途径,以灵活多样、喜闻乐见的形式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参考文献

- [1] U.S. Pacific Fleet Announces 29th RIMPAC Exercise [EB/OL]. May 2024, <https://www.cpf.navy.mil/Newsroom/News/Article/3783565/us-pacific-fleet-announces-29th-rimpac-exercise/>, 2024-06-16.
- [2] 张宇燕,冯维江.从“接触”到“规锁”:美国对华战略意图及中美博弈的四种前景[J].清华金融评论, 2018(7): 24-25.
- [3] Benedict Sang-Joon Kim. The United States and SEATO [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1965; Webb Leicester C, Australia and SEATO [C]. George Modelski (ed.). SEATO: Six Studies, Melbourne: F. W. Chesire, 1962, pp.49-82.
- [4] Donald Crone. Does Hegemony Matter? The Reorganization of the Pacific Political Economy [J]. World Politics, Vol.45, No.4, 1993, pp.501-525.
- [5] 王帆.美国亚太联盟多边化的可能性—基于协同性和威胁源的分析[J].当代美国评论, 2023(1): 1-23.
- [6] Weber Steve. Shaping the Postwar Balance of Power: Multilateralism in NATO [C]. John Gerard Ruggie (ed.). Multilateralism Matters: The Theory and Praxis of an Institutional For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233-292.
- [7] Victor D. Cha. Powerplay: Origins of the U.S. Alliance System in Asia [J].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34, No.3, 2009/10, pp.158-196.
- [8] 赵明昊.美国构建亚太“小多边”机制的进展、特征与影响[J].当代世界, 2023(3): 39-45.
- [9] Leszek Buszynski. SEATO: The Failure of an Alliance Strategy [M].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221.

- [10] G. John Ikenberry. America's Imperial Ambition [J]. *Foreign Affairs*, Vol.81, No.5, 2002, pp.44-60; Joseph M. Grieco. Understanding the Problem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he Limits of Neoliberal Institutionalism and the Future of Realist Theory [C]. David A. Baldwin (ed.).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The Contemporary Debat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301-338.
- [11] G. John Ikenberry. State power and the institutional bargain: America's ambivalent economic and security multilateralism [J]. Foot R, MacFarlane SN and Mastanduno M (eds.). *US Hegemony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49-70.
- [12] G. John Ikenberry. Between the Eagle and the Dragon: America, China, and Middle State Strategies in East Asia [J].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131, No.1, 2016, pp.9-43.
- [13] Daniel H. Nexon and Thomas Wright. What's At Stake in the American Empire Debate [J].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101, No.2, 2007, pp.253-271.
- [14] 樊吉社. 从亚太到“印太”: 美国地区安全战略的变迁与回归 [J]. *国际安全研究*, 2022(5): 30-52.
- [15] Evelyn Goh. Hierarchy and the Role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East Asian Security Order [J].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Vol.8, 2008, pp.353-377.
- [16] 李途. 美英澳伙伴关系与“印太”地区阵营化: 基于小多边主义的考察 [J]. *东北亚论坛*, 2023(6): 95-108.
- [17] Yasuhiro Izumikawa. Network Connections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Hub-and-Spokes Alliance System in East Asia [J].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45, No.2, 2020, pp.7-50.
- [18] Dick Wilson. *Asian Awakens* [M]. London: Widenfeld and Nicholson, 1970, p.269.
- [19] 王缉思. 中美关系中的“身份政治” [J]. *中国新闻周刊*, 2021(3): 24-25.
- [20] John S. Duffield. Why Is There No APTO? Why Is There No OSCAP? Asia-Pacific Security Institution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J]. *Contemporary Security Policy*, Vol.22, No.2, 2001, pp.69-95.
- [21] 高程. 美国对华战略竞争与亚太地区秩序演变 [J]. *当代世界*, 2023(11): 40-47.
- [22] Amitav Acharya. "Why Is There No NATO in Asia?" The Normative Origins of Asian Multilateralism [J]. Weatherhead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 Harvard University, Paper No.05-05, 2005, pp.1-54.
- [23] Amitav Acharya. How ideas spread: whose norms matter? Norm localization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Asian regionalism [J].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8, No.2, 2004, pp.239-275.
- [24] 孙兴杰. 美国战略收缩与中美关系演化 [J]. *国际问题研究*, 2021(1): 69-85.
- [25] Arthur A. Stein. Recalcitrance and initiative: US hegemony and regional powers in Asia and Europe after World War II [J].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Vol.14, No.1, 2014, pp.147-177.
- [26] Kai He and Huiyun Feng. "Why is there no NATO in Asia?" revisited: Prospect theory, balance of threat, and US alliance strategies [J].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18, No.2, 2011, pp.227-250.
- [27] 布迪厄. 国家精英 [M]. 杨亚平,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 457.
- [28] 布迪厄, 华康德. 实践与反思 [M]. 李猛, 李康, 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 164, 134.
- [29]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M]. Boston: 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1979, p.329.
- [30] Randall L. Schweller. Realism and the Present Great Power System: Growth and Positional Conflict Over Scarce Resources [C]. Kapstein and Mastanduno (eds.). *Unipolar Politics: Realism and State Strategies After the Cold War*, Columbia: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 p.28.
- [31] 兰德尔·施韦勒. 没有应答的威胁: 均势的政治制约 [M]. 刘丰, 陈永,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43-51.

- [32] 罗伯特·杰维斯. 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M]. 秦亚青,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 V-VII.
- [33] Raymond Cohen. Threat 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Crisis[J].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93, No.1, 1978, pp.93-107.
- [34] Charles Lockhart. *The Efficacy of Threat in International Strategies*[M]. Calif: Sage Sage Publications, 1971, pp.7-8.
- [35] 刘少杰. 后现代西方社会学理论[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155-156.
- [36] 熊玠. 金融海啸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启示[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9(10): 59-67.
- [37] 诺曼·里奇. 大国外交·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至今[J]. 时殷弘,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236-238.
- [38] Theodore A. Agoncillo. *A Short History of Philippines*[M]. Caloocan City: the Philippines, 1975, p.210.
- [39] Mercer Jonathan. Anarchy and Identity[J].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9, No.2, 1995, pp.229-252.
- [40] Hampton Mary. NATO, Germany, and the United States: Creating Positive Identity in Trans-Atlantia[J]. *Security Studies*, Vol.8, No.2-3, 1998/99, pp.235-269.
- [41] Cumings Bruce. *The Origins of the Korean War, The Roaring of the Cataract 1947-1950, Vol.2*[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79-97.
- [42] Hunt Michael. *Ideology and U.S. Foreign Policy*[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46-91.
- [43] Christopher Hemmer and Peter J. Katzenstein. Why is There No NATO in Asia? Collective Identity, Regionalism, and the Origins of Multilateralism[J].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6, No.3, 2002, pp.575-607.
- [44] 孔华润. 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下)[M]. 王琛, 周桂银, 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4: 279.
- [45] Nancy Bernkopf. Tucker, Chinese Taiwan, Chinese Hong Kong, and the United States[M]. Boston: Twayne Publishers, 1994, pp.22, 32.
- [46] Stephen Jin-Woo Kim. *Master of Manipulation*[M]. Yonsei: Yonsei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90-91.
- [47] John A. Thomson. *A Sense of Power: the Roots of America's Global Role*[M]. New York: Ithaca, 2015, chapt 6.
- [48] Lowy Institute Asia Power Index [EB/OL]. <https://power.lowyinstitute.org/data/economic-capability/>, 2023 Edition.
- [49] 愿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朝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N]. 人民日报, 2024-07-21.
- [50] 新时代中国的周边外交政策展望[N]. 人民日报, 2023-10-25.
- [51] Ruggie John Gerard. Third Try at World Order? America and Multilateralism After the Cold War[J].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109, No.4, 1994, pp.561-565.

[责任编辑 许 佳]

ABSTRACTS

On Building China's Image as a Responsible Major Country in the New Era

WANG Ya-qi WU Zhi-cheng · 3 ·

Abstract: Building an image as a responsible major country that is confident, self-reliant, open and inclusive and has a global vision is a historic achievement and change in China's foreign affairs in the new era. Taking confidence and self-reliance as its foundation, adhering to an independent and peaceful foreign policy, and carrying forward the fine tradition of having the courage to fight and being good at fighting, China not only maintains a correct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ational interests and international responsibilities, but also solidify the foundation for undertaking international responsibilities through its own development. China maintains a global vision, adds more substance to building a human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participates in and leads the global governance process based on the principles of extensive consultation, joint contribution and shared benefits, and takes the responsibility of a major country to promote the reform of the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China adheres to openness and inclusiveness, pursues a mutually beneficial strategy of opening up, promotes high-quality "Belt and Road" cooperation, deepens and expands the global partnership network, promotes exchanges and mutual learning among civilizations, guides economic globalization towards inclusive development, and promotes win-win cooperation and common development of all countries in the world. China has always placed its own development in the coordinate system of human development, firmly fulfilling its international responsibilities and obligations, and has become a stabilizing force for the turbulent and changing world, and a bulwark for promoting historical progress. China will surely make new and greater contributions to the cause of human progress.

Key Words: Responsible Major Country; National Image; Confident and Self-reliant; Global Vision; Open and Inclusive

Political Polarization and the Implementation Path of the U.S.-Led 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for Prosperity

XU Xiu-jun CHANG Fang-yu · 16 ·

Abstract: The 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for Prosperity (IPEF) is an initiative proposed by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to compensate for the lack of economic pillars in the U.S. Indo-Pacific Strategy. Its main purpose is to establish a Chinese exclusion economic circle in the Indo-Pacific region to contain China and leverage the power of allies to drive its own economic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mplementation path, influenced by political polarization in the U.S.,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has chosen to adopt an executive and modular path to promote the IPEF in order to avoid the impact of partisan struggles in Congress. However, while the executive path has brought convenience, it has also made the IPEF lack legal safeguards, vulnerable to changes in the ruling party and constrained by executive authority to include free trade-related elements. At the same time, the modular path has also caused an imbalance in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of the Supply Chain Pillar, the Clean Economy Pillar, the Fair Economy Pillar, and the Trade Pillar. Even if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is able to make a breakthrough in trade negotiations, the expansion and deepening of the Trade Pillar still needs to be supported by congressional legislation, and ultimately it is still difficult to bypass the constraints of political polarization.

Key Words: Political Polarization; 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for Prosperity (IPEF); U.S. Regional Cooperation Arrangement; Executive Path; Modular Path

United States Supply Chain Alliances Formation: Progress, Types, and Prospects

LI Chong CHEN Zhao-yuan · 32 ·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increasing strategic competition between major countries and global challenges, the scope of alliances has gradually expanded from the conventional military sphere to global governance issues such as supply chains. After the 9/11 attacks, the United States witnessed an accelerated trend towards "alliance-based" international supply chain cooperation: elevating supply chain issues to the security level, identifying certain countries as sources of potential threats to supply chains, and collaborating with its allies to implement collective measures such as export controls, economic sanctions, and investment reviews targeting the supply chains of competitors. During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the United States developed a supply chain alliance framework aimed at achieving "collective resilience," encompassing multiple regions, sectors, and links. There are significant variations in the types of commitments and institutional levels of U.S. supply chain alliances. Supply chain alliances that cover the Asia-Pacific region, target key emerging technologies such as semiconductors, and comprise members with strong economic and security ties to the United States usually exhibit operational commitments and higher levels of institutionalization. Supply chain alliances are part of the U.S. foreign policy for the middle class and an important tool to maintain its hegemonic position and strengthen strategic competition with China, exerting significant impacts on global supply chain stability, great power games, and the U.S.-China strategic competition. The U.S. supply chain alliances possess significant potential for further enhancement, and their prospects will be directly affected by the election results.

Key Words: Supply Chain Alliances; Global Governance; China-U.S. Relations; U.S. Diplomacy; Securitization

Analysis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U.S. Asia-Pacific Strategic System Based on Field Theory

YANG Mei-jiao · 47 ·

Abstract: With the transformation in the "time" and "trend"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landscape has undergone key changes,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U.S. Asia-Pacific strategy has attracted widespread attention from academia. Based on the model of the field theory, combined with the strategic develop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since the end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it can be found that the dual effects of strong positional advantages and high threat perception have influenced the emergence of the hub-and-spokes system. Weak positional advantages and high threat perception have stimulate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multilateral alliance system. Since the end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the U.S. Asia-Pacific strategic architecture has evolved from the hub-and-spokes system to the American-style multilateral "latticework" of alliances and partnerships.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changes in the power comparis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and the escalation of geopolitical games, the U.S. Asia-Pacific strategy also shows a dual form of change and constancy. The change l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weakened positional advantage in the Asia-Pacific, while the constancy is reflected in its continued high degree of threat perception in the Asia-Pacific field, all serving to maintain U.S. hegemony. In view of this, China can effectively respond by optimizing the regional opening layout to strengthen its influence, exploring new models of interaction both within and outside the region, and enhanc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thereby gaining strategic initiative in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Key Words: Positional Power; Threat Perception; Field Theory; Hub-and-Spokes System; Latticework of Alliances and Partnerships

The Important Practice of Building a Regional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Analysis of China-ASEAN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Cooperation

FAN Jia-ru · 62 ·

Abstract: China is leveraging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o establish a spatial connectivity network by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with neighboring